

數位時代媒介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成因之析探： 網路與非網路使用族群之比較分析*

張鎧文、莊文忠**

摘要

政治知識攸關民主政治運作的良窳，不僅隱含公民對政治事務的認知，公民評價政治世界的能力，更是公民參與品質的礎石。有趣的是，公民在不同時期擷取政治知識之途徑不盡相同，尤其在二十一世紀，受惠於新興資訊科技的推陳出新，大眾傳播媒體所具備之資訊傳播能力無遠弗界，能提供公民更便利、更豐富、更即時的政治新聞，對政治知識的傳播管道產生重大的影響。換言之，傳播媒介的蓬勃發展為公民創造一個豐富的資訊環境，不僅大幅提昇資訊的內容與數量，也增加公民選擇資訊的自由，甚至能夠讓公民由資訊的接收者轉變為資訊的提供者，在這個脈絡中討論公民的媒介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之間的關係更具有意義。準此，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是探究公民的傳播媒介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之間的關聯性，並聚焦於網路與非網路的使用族群，比較分析媒介使用行為對其政治知識所產生之影響。

本研究先從相關文獻中歸納出媒介使用行為和政治知識之間的若干假設，再採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在 2008 年所執行之「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資料加以檢證。本研究的重要發現如下：首先，網路與非網路使用族群在人口結構、媒介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上有明顯差異；其次，相同的媒介使用變項對解釋網路與非網路使用族群之政治知識的效果不盡相同，顯示這兩個族群不僅在人口結構、媒介使用行為或政治知識存在差異，甚至影響到人口結構與媒介使用行為對政治知識的解釋效果；第三，網路使用族群具備「高度媒介使用，低度模型解釋」的特質，且新興媒介的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取得的關聯性並不高；最後，評估網路使用族群的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之間的關係更顯複雜，可能會因為使用者偏好某些特定的議題，或受到不正確的資訊影響，而干擾媒介使用行為對政治知識變異的解釋能力。

關鍵字：政治知識、媒介使用行為、媒介暴露、媒介注意、媒介參與、階層迴歸

* 本研究所使用之分析資料採自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支助之「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四次調查計畫」。該計畫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計畫主持人為張荳雲與廖培珊教授，資料由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釋出，作者表示感謝之意。

** 張鎧文為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博士生，電子郵件：ice_lattes@yahoo.com.tw；莊文忠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電子郵件：jwj@cc.shu.edu.tw。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in the Digital Er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ong Internet and Non-internet Users.

Teng-Wen Chang and Wen-Jong Juang***

Abstract

Political knowledg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which not only implies the citizen's recognition to political affairs but their ability to evaluate the political world as well as the foundation to the quality of citizen involvement. Interestingly, citizens discover different paths to capture political knowledge, particularly in the 21st century where the benefi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equipped the mass media with ability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providing the citizens with more convenient, various and immediate political news and resulting in major impact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political knowledge. In other words, the boom of dissemination media also creates a rich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for the citizens, which not only substantially improves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and quality but also increases the freedom for citizens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choices. The citizens may even become the information providers instead of information recipient, contributing to a more significant discussion from the context on the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of citizens. For this reason,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se of media and the political knowledge in citizens, with focus on the internet and non-internet user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impact from media use on political knowledge.

The study concluded with several assumptions between the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from relevant literature, followed by adopting the data from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implemented by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 Teng-Wen Chang is the Ph. D. student of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ice_lattes@yahoo.com.tw. Wen-Jong Juang is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Shih Hsin University. Email: jwj@cc.shu.edu.tw.

in 2008 with verification. The study drew important discoveries as described below: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internet and non-internet user in terms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2. The same media use variables for explaining the effect on the political knowledge between the groups of internet and non-internet user are not completely the same, indicating that these two groups not only different in terms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but even affect the explanatory effects for demographic structure media use on political knowledge. 3. Internet user have characteristics in “high media use and low modular explanation” while the user of emerging media contains low correlation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political knowledge.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of internet user become more complex, which could possibly be interfered with media use on the explanatory ability of changes in political knowledge due to specific user preference on certain issues or subject to effect from incorrect information.

Keywords: political knowledge, media use, media exposure, media attention, media participation,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壹、前言

關於公民角色與政治參與兩者的關係，向來是政治理論所關注的焦點。古典民主理論的觀點中，人民被視為具備充分知識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此種知識有助於公民參與民主政治的運作，同時，藉由參與政治活動的過程，亦能提升公民的知識與技能，進而增加其對政治事務的瞭解及運作的能力。然愈來愈多的研究結果顯示，公民對於政治事務的瞭解程度與古典民主理論的假設大相逕庭（Delli Carpini & Keeter, 1993），多數公民對政治相關事務的認知很少，甚至是一無所知（Delli Carpini & Keeter, 1996; Visser, Holbrook & Krosnick, 2008；林瓊珠，2005）。因此，修正民主的理論家提出不同論點，主張大多數公民是無知的，並不具備足夠的政治素養，缺乏政治相關的知識與技能，因而複雜的政治事務應該交由專家來處理，據此強調代議政治乃是必要的制度。不過，由於修正民主論者過度相信政治菁英的治理能力，忽略公眾參與的潛在能力，反而引起其他學者的質疑。

事實上，晚近的民主理論發展則趨向調和古典民主與修正民主的優劣。渠等指出鑑於現代政治事務的複雜性，施行直接民主勢必窒礙難行，但代議民主的運作也有若干限制，此一代議制度雖然可以有效處理複雜的政治事務，卻往往忽略公民意見或公民參與的重要性（Salazar et al, 2008）。因此，論者剴切指陳，如果能夠透過教育民眾、提供資訊，進而促使公民參與政治事務，將人民的需要、意見加以整合，不失為達到古典民主價值，同時彌補代議民主缺陷之良方（陳敦源，2010）。由此可知，民主政治運作的良窳端視公民之政治知識的充足與否，即使是代議政治，人民將治理的權力與責任交給政府，仍然需要相當的政治知識才能監督政府的施為，維護自身的權益（Visser, Holbrook & Krosnick, 2008；陳敦源，2009，陳敦源，2010），尤其是在民主治理的潮流下，公民參與的概念迄今已被民主先進國家視為彌補代議民主不足的機制之一，無論學界或者實務界均肯定公民參與所帶來的效益。

然而，在實踐公民參與的過程當中，「公民是否具備足夠的知識、技能參與公共事務」的大哉問，其實攸關整個民主機制運作的設計效果。因為將公民視為欠缺足夠參與知能的假定，往往成為政治菁英強化自我統治正當性的藉口之一（陳敦源，2010：15），吾人若能建立一套指標衡量公民是否具備足夠的知識、技能參與公共事務，提出具體的證據來推翻上述邏輯的謬誤，將有助於削弱政治菁英宰制公民，增強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正當性。因之，政治知識的相關測量與研究乃因應而生。不過，雖然政治學者已發展出測量政治知識的若干方式，但迄今仍缺乏強健的證據證明其測量方式的有效性（Visser, Holbrook & Krosnick, 2008）。換言之，除了測量公民的政治知識水準之外，學者亦開始探討政治知識測量的信、效度問題，如 Delli Carpini 與 Keeter（1993）藉由研究檢證政治知識測量的效度，發現政治知識的測量可以反映出公民對於政治事務的瞭解，確立政治知識的價值。Kuklinski 與 Quirk（2001）從闡述公民能力的概念為開端，說明公民可能遭遇的特殊活動（specific

tasks)，以及應該以何種標準來評斷公民在這些活動的表現、上述標準的可觀察指標為何及評估這些指標的標準（轉引自 Visser, Holbrook & Krosnick, 2008: 128）。

就此而論，政治知識攸關民主政治運作的良窳，其所隱含的意義是公民對於政治事務的認知、公民評價政治世界的能力，更是公民參與品質的礎石（Galston, 2001; Jenssen, 2009; Shaker, 2009）。有趣的是，不論從政治社會化理論或資訊傳播理論進行觀察，均可發現在不同時期，人民擷取政治知識之方式不盡相同，此引起政治與傳播學者高度的興趣（Bucy & Gregson, 2001; Jenssen, 2009; Shaker, 2009），尤其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大眾傳播媒體所具備之資訊傳播的能力無遠弗界，從每天的報紙、電視、廣播與雜誌等媒介均可發現政治相關資訊，加上各種網際網路服務的應用，亦能提供公民更豐富、更即時的政治新聞¹。於是，遂有學者開始探討大眾傳播媒體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兩者之間的關聯（Bucy & Gregson, 2001; Galston, 2001; Jenssen, 2009; Shaker, 2009; Kaufhold, Valenzuela & Zúñiga, 2010；黃秀端，1996；傅恆德，2001；林瓊珠，2005；傅恆德，2005；王嵩音 2006，彭芸，2007）。

換言之，受惠於新興資訊科技的推陳出新，包括 Web2.0 的應用、各種可攜裝置與無線網路的普及與雲端科技的推動等，已經大大提升資訊傳播的速度與便利（林東清，2008），對政治知識的傳播方式也逐漸產生影響（Bucy & Gregson, 2001; Tewksbury, 2003; Shaker, 2009; Kaufhold, Valenzuela & Zúñiga, 2010）。Bucy 與 Gregson（2001）指出，自 1990 年代之後，大眾傳播媒體在形式上產生重大的發展與轉變，包括網際網路、談話性廣播（talk radio）、電視 call-in 與數位論壇的發展及應用，逐漸改變傳統政治事務與公民的關係，透過這些新興媒介（new media），公民可以擁有更多接觸政治知識的管道，更多談論政治事務的場域，得以強化民主的發展。Kaufhold、Valenzuela 與 Zúñiga（2010）也強調，受惠於各種線上（online）與離線（offline）傳播媒介的發展，當代的新聞傳播業處於一個十分複雜的生態環境之中，三位作者更進一步指出，除了新聞的傳播媒介漸趨多元之外，在新聞的品質與內容方面亦發生重大轉變，最明顯的趨勢就是，新聞的內容不再由專業新聞社群所壟斷，公民也可以成為新聞內容的編寫者與提供者，形成一種「參與式」（participatory）或「以使用者為中心的」（user-centered news）的公民新聞主義（citizen journalism），對於公民政治知識的形塑以及政治參與的行為均可能產生影響。由此可知，上述資訊媒介的蓬勃發展，為公民創造出一個豐富的資訊環境（Bucy & Gregson, 2001; Shaker, 2009），不僅大幅提昇資訊的內容與數量，同時也增加公民選擇資訊的自由（Tewksbury, 2003; Holmeas, 2004），甚至能夠讓公民由新聞資訊的接收者轉變為提供者（Kaufhold, Valenzuela & Zúñiga, 2010）。因此，在這樣資訊環境中討論公民的媒介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之間的關係更具有意義，特別是在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的蛻變之下，可以確定的是，未來網際網路的應用將與公民生活更緊密結合，走進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那麼可以預見的是，網路使用族群將會愈來愈多，對網路使用族群與非網路使用族群之政治知識將產生何種影響不能不加以關注。

¹ 近來不少的搜尋引擎的首頁，均提供最新、最即時的各類新聞供民眾查詢使用。

回顧國內政治知識的相關研究，雖然提供相當豐碩的成果，似乎仍有若干可以精進之處，這也是本研究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析探之處。首先，大部分的研究使用測量媒介使用行為的變項不夠充足，無法含蓋完整的公民媒介使用行為（彭芸，2007；翁秀琪、孫秀蕙，1994；劉嘉薇，2006），因此，本研究除了測量受訪者的「媒介使用的暴露」（media exposure），也將「媒介使用的注意」（media attention）納入模型中，同時分析這兩者與政治知識的關係；其次，過去研究甚少關注到網路使用行為對政治知識的傳播效果，然在網際網路普及化的社會中，資訊科技實已改變公民新聞閱聽的本質與行為，值得深入探究網際網路與政治知識的關係（Tewksbury, 2003），故本研究亦分析傳統媒介與新興媒介對政治知識的影響程度；再者，由於網際網路具備即時互動性功能，並提供公民參與及討論政治事務的場域，逐漸改變公民新聞閱聽的模式（Bucy & Gregson, 2001），是以，公民透過網際網路表達意見的行為對於政治知識的影響，亦為本研究關注的議題之一；最後，根據過去的研究結果指出，網路與非網路使用族群在教育程度、工作狀況、從業身分及生理條件等個人屬性，均有明顯的不同（行政院研考會，2011），故針對兩大使用族群進行分析與比較，以瞭解兩者基本屬性的差異是否會反應在媒介使用行為、政治知識取得以及媒介使用行為對政治知識的影響上，也是本研究特別著重的研究焦點。

本研究為求更完整地窺探公民的媒介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擷取之間的關聯性，乃利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在 2008 年執行之「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四次大眾傳播組（問卷一）」資料進行分析，特別納入網路參與的行為變項，進一步探究現今多元化的媒介使用行為與獲取政治知識之間的關聯，希冀補足過去研究的缺口；同時，將影響政治知識的重要控制變項，如性別、年齡與教育程度等「人口基本變項」納入模型，檢證公民的媒介使用行為對於政治知識擷取之影響程度。值得特別說明的是，本文之研究對象特別聚焦於網路使用族群，瞭解此一族群的媒介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之關聯，主要的研究問題分為兩個層次：（1）網路與非網路使用族群的政治知識是否不同？兩者在人口基本變項的組成結構有何差異？（2）網路與非網路使用族群的政治知識是否媒介使用行為的影響？傳統媒介與新興媒介的使用行為何者的影響力較大？這兩個問題的回答，不僅可以幫助吾人更深入地瞭解影響公民政治知識高低的關鍵因素，也可以得知不同媒介使用行為對其政治知識的解釋力。

貳、政治知識與媒介使用的關係

環顧國內過去有關政治議題的研究，對政治知識變項的使用十分頻繁，常將其視為瞭解公民理解政治事務的重要面向之一，尤其是在研究選民投票行為的領域，通常用此一變數來解釋選民的投票行為或者政治態度（林瓊珠，2005：150），晚近則有學者開始探討政治知識的來源與變動情形（羅文輝、鐘蔚文，1991；翁秀琪、

孫秀蕙，1994；黃秀端，1996；蕭湘文，1999；傅恆德，2001；林瓊珠，2005；傅恆德，2005，彭芸，2007），不過，有關政治知識與傳播媒介使用行為的研究仍不多見，這正是本研究的焦點與貢獻之所在。在闡述政治知識與媒介使用行為的關係之前，實有必要針對政治知識的內涵進行說明，故本節先透過檢視過去政治知識的相關研究與文獻，描繪出政治知識的輪廓，藉以闡述政治知識的本質與內容及其對民主治理的重要性；接著，論述公民之媒介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間的關聯性，藉以提出本文之研究假設，作為後續實證分析之基礎。

由於政治的內容包羅萬象，隨著觀察的角度不同，學者所賦予的定義亦有所差異。因此，究竟政治知識的內涵為何？又可以劃分為哪些面向？乃成為學者所探討的問題之一。如 Jennings (1996) 就指出，政治知識的測量不同於政治熟練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或意識 (awareness) 的內容，應更聚焦於政府與政治事實層面的測量，故 Jennings 提出三種不同類型的政治知識：教科書知識 (textbook knowledge)、觀察知識 (surveillance knowledge) 與歷史事實 (historical facts)，其中，教科書知識主要詢問關於政府與政治運作過程的相關機制；觀察知識是測量對時事的瞭解，兩者相較下，前者變動較少可透過學校教育傳遞，後者因時間變化有所不同大部分是由大眾傳播媒體傳遞；而歷史事實較前面兩者形成時間較長，傳播管道也更多元。

Delli Carpini 與 Keeter (1993) 將政治知識的內涵描述地更加詳盡，主要劃分為四大構面：首先，引述 Neuman 的觀點，將「政府的本質」(what government is) 概念加以操作化，認為政府的本質就是指涉政府的基本結構，包括政府基本的價值與元素，其中基本價值係指公民參與、多數決、分權制衡、公民自由，而基本元素則為兩黨制、國會、司法的角色等制度設計；接著，借用學者 Berelson、Lazersfeld 與 Mcphee 的看法，強調作為一個民主的公民 (democratic citizen) 應該具備充足的政治相關知識，特別是對於「政府的施為」(what government does) 的認知，包括瞭解政治議題、過去的歷史、相關的事實、被提議的替選方案、政黨的態度以及預測最有可能發生的結果；第三，選舉為公民最重要的政治權力，也是民主價值的展現，因此，公民具備對政治領袖、政黨與政黨聯盟的相關知識格外重要；最後，政治系絡提供一個有助於瞭解當前政治的框架，政治歷史與政治經濟的相關知識因而也不容忽視。質言之，政治知識涉及公民對政府本質與施為的理解、民選政治人物的認知以及政治相關環境的認識四大部分。

至於政治知識的取得管道，可能包括家庭社會化過程、學校正式教育及大眾媒體傳播等。基於研究旨趣，本研究將討論焦點放在傳播媒介的面向上。另一個原因則是，一般而言，在民主系絡下，大眾傳播媒體傳達資訊的能力受到政府較少的限制，特別是政治相關資訊的提供方面，不易成為政府權力控制的工具，對於人民政治知識的型塑能力引起學者們的注意，尤其在資訊科技迅速發展的今日，諸多學者更相信傳播媒介強大的通訊與傳播功能，勢必造成一股新的傳播革命，甚至能夠提升民主的內涵 (Hacker & Dijk, 2000; Bucy & Gergson, 2001; Kampen & Snijkers, 2003; Kakabadse, Kakabadse & Kouzmin, 2003; Garson, 2006)。所以，在新興民主

社會的系絡下探討公民的媒介使用行為更具有意義。以下說明不同傳播媒介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的關聯，進而提出本文之研究假設，至於測量媒介使用行為的方式留待後面章節繼續討論。

一、媒介使用暴露程度與政治知識

從政治社會化理論的角度觀察，學者大多肯定大眾傳播媒體傳遞政治資訊的功能，採用「媒介暴露」理論的觀點探求媒介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的關聯。論者主張民眾接觸新聞媒介的時間愈長，一方面對政治事實知識的獲取有正面幫助，且對政治事務的認知也愈正確（Delli Carpini & Keeter, 1996; Tewksbury, 2003；黃秀端，1996；林瓊珠，2005；林聰吉、王淑華，2007，彭芸，2007）；另一方面當民眾的媒介使用頻率愈高，其所受到的社會化程度亦愈高（瀟湘文，1994）。換句話說，當民眾與媒介接觸時間愈長，所接收的資訊就愈多，也愈能瞭解現行政治體制的運作與公共政策的制定。當然，值得注意的是，民眾所接觸的節目類型也將影響其政治知識的獲取程度，如黃秀端（1996）的研究發現指出，民眾所接觸的節目類型是否為政治相關內容，對於民眾政治知識的吸收有其影響，因為假使民眾所接觸的節目內容大多集中在娛樂性質，那麼對於政治方面的資訊自然較少提及，在政治知識的擷取上勢必相對減少。據此，本研究在測量網路使用族群的媒介暴露程度時，特別針對民眾接觸「政治性質」相關節目或內容的頻率加以詢問，同時將媒介的類型區分為傳統（非網路）與新興（網路）兩種類型，整合上述的論點，提出以下假設：

H1a：使用者的傳統媒介暴露程度，對其政治知識有正面影響。

H1b：使用者的新興媒介暴露程度，對其政治知識有正面影響。

二、媒介使用注意程度與政治知識

自密西根政治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political studies）在 1979 年的研究中，將「媒介暴露」與「媒介注意」兩者加以區分後，研究政治知識的部分學者亦贊同在測量媒介使用行為時，不應忽略民眾在使用該項媒介時的注意程度（Moy et al, 2004；翁秀琪、孫秀蕙，1994；劉嘉薇，2006）。申言之，從學習行為的論點出發，民眾使用媒介時的注意程度，對於政治知識的吸收程度將會產生影響，意味著民眾的政治知識擷取程度，除了受到與媒介接觸頻率之客觀行為左右之外，同時也將取決於使用者的心理因素。雖然本文認為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有關注意程度之題項的語意設計上未臻完善，可能會因為受訪者個人的解讀不同，而影響受訪者填答的結果，但是考量上述學者之觀點與建議，仍將其一併納入分析，藉此瞭解其與於政治知識之關聯。總結上述的論點，並區分傳統（非網路）與新興（網路）媒介的影響，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假設：

H2a：使用者的傳統媒介注意程度，對其政治知識有正面影響。

H2b：使用者的新興媒介注意程度，對其政治知識有正面影響。

三、媒介使用參與程度與政治知識

Buchanan 觀察 Markle 委員會的運作發現，越來越多的公民甘願成為選舉過程中的旁觀者 (spectator)，而候選人與媒介反而躍升為選舉過程的重要主角 (轉引自 Bucy & Gergson, 2001: 357-358)，點出現今代議民主的弔詭之處。就此而論，目前的民主運作機制，似乎忽略公民應具備之角色與能力，而將焦點錯置於其代理人身上，間接造成公民對於政治事務的冷漠感，亦阻礙公民增進自身參與政治事務之技術及能力，所幸受惠於資訊科技的發展與應用，上述民主的窘境獲得部分的改善。Bucy 與 Gergson (2001) 就指出，自 1990 年代新興媒介出現之後，逐漸擴大公民的參與管道，除了投票之外，公民也能透過新興型態媒介來參與政治活動。此外，新興型態媒介也激起公民對於政治參與的熱情。換句話說，渠等認為愈來愈多參與管道的出現，不僅能夠提高公民對政治事務的熱情，同時也促進公民參與政治的意願。是以，藉由公民參與的過程，不但能夠提升公民的知識 (黃東益，2003)，甚至促使公民為了參與而先行提昇自身的知識 (林瓊珠，2005)，這些效益都是公民參與可能帶來的效益。職是之故，本文認為公民的媒介參與行為，亦將影響民眾政治知識的獲取程度，而且根據 Best 與 Krueger 的看法，公民在從事傳統參與 (非網路) 與線上參與時，兩者需要的資源、技能不盡相同 (Best & Krueger, 2005)。準此，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H3：使用者的新興媒介參與程度，對其政治知識有正面影響。

四、人口基本變項與政治知識

為能分析網路使用者之媒介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兩者「純然」的關係，本研究將其他對政治知識可能有影響的變數當作控制變項，以顯現媒介使用行為對於政治知識的影響，然，檢視文獻後發現除了媒介使用行為之外仍有各式各樣的變項影響著民眾政治知識之獲取，在考量研究目的與調查資料性質之後，本研究選擇人口基本變項 (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 作為控制變項，相關變項的處理請參見附錄一，在此先就這些控制變項與政治知識之間的關係作一說明。

在性別方面，性別差異對政治知識的影響向來為學者們有興趣的議題，如黃秀端 (1996) 研究民眾的政治知識是否存在性別差異，透過多元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在控制教育、選舉興趣、媒介暴露程度、年齡等因素之後，性別仍然達到顯著水準，且男性的政治知識分數也高過女性；林瓊珠 (2005) 使用多元迴歸分析民眾政治知識長期的變動，也獲得相同的結論，性別差異的確影響民眾政治知識的高低，而且

男性分數同樣高過女性，但是從歷年調查結果之迴歸係數可以瞭解，由性別差異造成的政治知識分數差距逐漸縮小。在年齡方面，因為年齡與政治知識之間的關係並不明確，有時達到顯著水準，有時則否，容易受到其他變項的影響(林瓊珠，2005)，但從社會化的觀點，隨著年齡漸長所接觸的政治事務也會相對較多，反應在政治知識的分數也相對較高。在教育程度方面，一般而言，類似於媒介暴露理論，當民眾所受的教育愈多，其知識必然有所增加，對於政治知識也是具有類似的影響力(Delli Carpini & Keeter, 1996)，但是，林瓊珠(2005)發現教育的影響力逐年下滑中，或許是大眾媒體愈來愈多元化，而間接導致學校教育之社會化功能逐漸下降的結果，至於原因是否如此，仍然需要其他研究加以佐證。

參、研究架構與變項測量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比較分析網路與非網路使用族群的媒介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之間的關聯性，本研究經由上述的文獻分析，發展出五個研究假設，除了一般學者所關注的「媒介暴露」(區分為傳統與新興)及「媒介注意」(區分為傳統與新興)的單向傳播變項之外，同時加入 1990 年代後所出現的「新興媒介參與」這個互動式傳播變項，以此五個變項作為本研究之自變項，用以解釋政治知識獲取之成因，並且以「人口基本變項」(性別、年齡以及教育程度)當作控制變項，檢證媒介使用行為對於網路使用者政治知識擷取之影響力，研究架構如表 3-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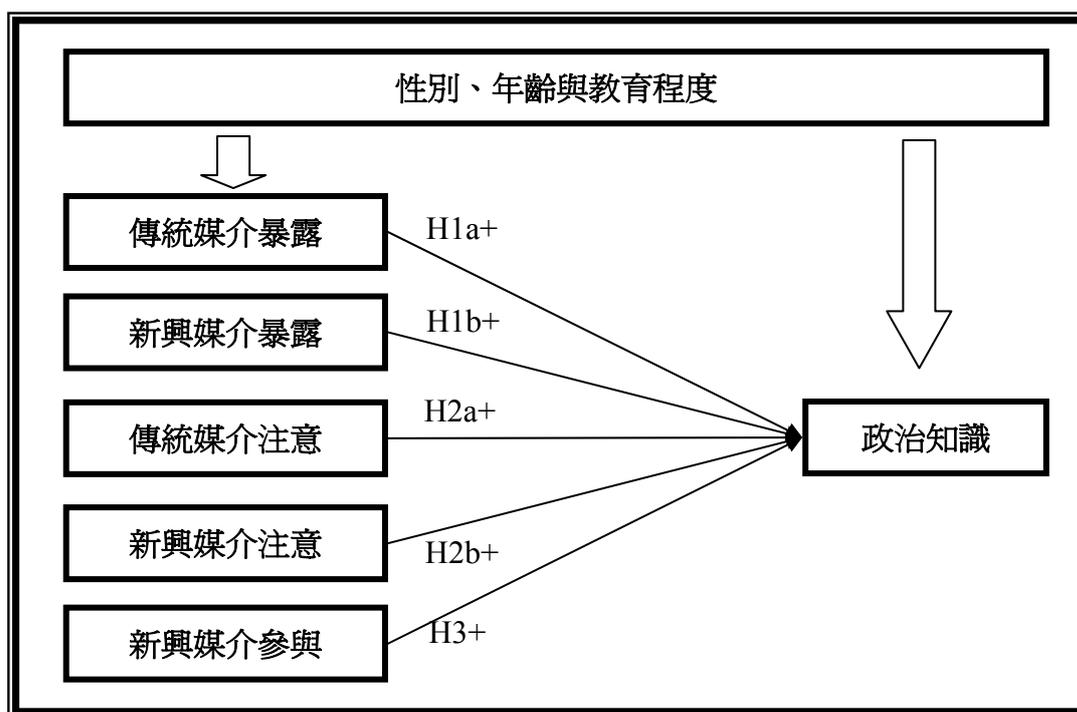


圖 3-1 研究架構

二、資料來源與抽樣設計

本研究使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在 2008 年所執行之「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四次大眾傳播組(問卷一)」研究案，利用其所蒐集之資料驗證本研究提出之假設。該研究案係由張荳雲與廖培珊所主持的全國大型面訪研究案，以臺灣地區年滿 18 歲以上之國民為研究母體，以戶籍資料檔作為抽樣清冊，利用分層等機率三階段抽樣方法選出訪問對象，成功訪問 1,980 個樣本。值得說明的是，本研究的焦點是針對有無使用網路經驗的民眾進行比較分析而非全體民眾，因此，本研究以該次調查中題項 c1，詢問民眾「去年一年內，您大約多久上網一次？」作為區分網路使用族群與非網路使用族群的標準，回答網路使用頻率至少「一年一次」的民眾歸類為網路使用族群，而回答「以前曾上網，但去年一年都沒有」或者「從來沒有」的民眾歸類為非網路使用族群。據此，本次調查中網路使用族群為 1127 人，非網路使用族群則為 853 人，後文分析的推論與解釋均區分為網路使用族群與非使用族群兩種媒介使用類型。

三、變項測量與操作化

(一) 政治知識的操作化

如前文所述，政治知識幾乎概括政治事務的所有內涵，對此一抽象而廣泛的概念進行測量時，必定無法鉅細靡遺地針對所有事務一一向民眾詢問，究竟該如何操作化，各學者亦有不同建議。如 Jennings (1996) 指出政治知識可以劃分為教科書知識、觀察知識與歷史事實三種類型；Delli Carpini 與 Keeter (1993) 認為政治知識可以區分為對政府本質與施為的理解、民選政治人物的認知以及政治相關環境的看法等四大構面；黃秀端 (1996) 依政治知識的內容區分為政治人物、制度與過程、問題與政策、以及歷史和現代政治結盟等類型；林瓊珠 (2005) 則指出，政治知識的測量大抵包括對於政治人物的認識、政治制度與過程的認識、對議題所持有的立場，以及對國際事務的瞭解四大面向。據此可知，政治知識的內涵包羅萬象，過去的研究成果實已提供吾人若干測量政治知識的參考基準，本研究整合上述學者之分類，認為政治知識在概念上可以區分為對於政治人物的認知、政府的基本價值、政治制度與過程的瞭解（政府的要素）、重大政策或議題的看法（政府的施為），以及國際事務（環境）的訊息等五大類型。

在本研究所使用之「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中，測量政治知識的題目如表 3-1 所示。其中，詢問政治人物有 2 題，詢問政治制度與過程有 1 題，詢問國際事務有 1 題，此與國內其他研究所採用的面向相似（翁秀琪、孫秀蕙，1994；黃秀端，1996；傅恆德，2001；林瓊珠，2005；傅恆德，2005），但值得注意的是，依照黃秀端 (1996) 與林瓊珠 (2005) 對於政治知識內容的定義而言，一個「完整的」政治知識的測量，應該也包含著民眾對「政府的基本價值」以及「重大政策或議題的

看法」，然而，在國內相關政治知識的研究鮮少測量民眾對重大政策或議題看法的題目，其原因或許是每年的政策議題性質並不相同，加上民眾本身的態度與價值也會影響其對政策的關注 (Holmes, 2004)，容易造成政治知識的測量結果波動過大；另外，缺少詢問民眾關於政府基本價值的題組，可能是因為贊同 Delli Carpini 與 Keeter (1993) 的建議，認為測量政治知識最好的指標，就是詢問民眾對於政治事實性的瞭解 (factual knowledge)。關於政治知識的變項處理，本研究利用加總的方式加以合併題目，每答對 1 題給予 1 分，答錯與未答不給分，變項處理參見附錄一。

表 3-1 政治知識測量題目

題號	題目內容	構面
e1a	您知不知道目前我國憲法規定的總統任期是幾年?	政治人物
e1b	您知不知道現在的中國大陸領導人是誰?	
e1c	您知不知道目前我國憲法規定的總統任期是幾年?	制度過程
e1d	您知不知道下列三個國家中，哪一個國家和臺灣有正式邦交?	國際事務

資料來源：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四次：大眾傳播組(問卷一)

(二) 媒介使用行為的操作化

過去的研究對於媒介使用行為的測量面向略有不同。大部分的研究認為「媒介暴露」是測量媒介使用行為最客觀的數值，成為多數研究所採用的變項，不過，翁秀琪、孫秀蕙 (1994) 指出，對於媒介使用行為的測量，除了使用「媒介暴露」之外，也應將「媒介注意」一併納入分析，劉嘉薇 (2006) 亦提出相同的看法，主張在分析傳播媒介的使用行為不能只採用「媒介暴露」作為衡量標準，應該包括「媒介暴露」以及「媒介注意」兩個變項。而 Bucy 與 Gregson (2001:358) 則進一步提出「媒介參與」(media participation) 的概念，指出目前的媒介型態並非過去單向的提供閱聽眾資訊，同時也具備讓閱聽眾表達意見的功能。就此而論，觀察臺灣目前的媒介型態，許多媒介實已具備提供閱聽眾表達意見的功能，例如報紙和雜誌提供讀者投書的版面，廣播和電視節目開放現場扣應 (call-in)，電視節目舉辦電話或簡訊的投票，網路 BBS、留言版、討論區以及目前最熱門的部落格 (Blog) 等，皆具備讓閱聽眾表達意見的功能，此類透過媒介傳達政治相關的看法或意見屬於上述「媒介參與」的範疇 (張卿卿，2002：45)。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一個比較完整的媒介使用行為的測量應該包含「媒介暴露」、「媒介注意」以及「媒介參與」三個構面。

在本研究所使用之「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中，測量媒介使用行為的相關題目如表 3-2 所示。其中，依照媒介類型的差異，本研究將測量民眾媒介使用行為的構面區分為「傳統媒介暴露」、「新興媒介暴露」、「傳統媒介注意」、「新興媒介注意」

及「新興媒介參與」五大構面，其中「媒介暴露」主要詢問受訪者使用大眾傳播媒體時與政治相關資訊接觸的頻率；「媒介注意」用來瞭解受訪者使用大眾傳播媒體時，對政治性資訊的注意程度；「媒介參與」則是測量受訪者透過網路表達自身對於政治議題看法的程度。在此五個自變項當中，原先所有題目選項均為 Likert 尺度，變項的處理參見附錄一。

表 3-2 媒介使用行為測量題目

構面	類型	題號	題目內容
媒介暴露	傳統	d7a	您觀看電視上的政治新聞嗎?
		d8a	您閱讀報紙所報導的政治新聞嗎?
	新興	d9a	您閱讀電子報、bbs 或網路上的政治新聞嗎?
媒介注意	傳統	d7b	當您觀看電視上的政治新聞報導時,您的注意程度為何?
		d8b	當您閱讀報紙所報導的政治新聞時,您的注意程度為何?
	新興	d9b	當您閱讀電子報、bbs 或網路上的政治新聞時,您的注意程度為何?
媒介參與 ⁴	新興	c15b	請問您透過網路和朋友討論政治話題的情形如何?
		c15c	請問您透過網路向媒體表達我對政治議題的看法的情形如何?
		c15d	請問您透過網路向民意代表或政治人物反映對政治議題的意見的情形如何?
		c15e	請問您在網路上表達我對政治議題的看法的情形如何?
		c15f	請問您在網路上參與與政治相關議題進行投票的情形如何?

資料來源：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四次：大眾傳播組(問卷一)

肆、結果與分析

為能回答網路與非網路使用族群的政治知識、這兩個族群的人口組成結構是否明顯不同？並進一步分析這兩個族群的政治知識主要是受到哪些媒介使用行為的影響？本研究分析步驟如下：首先，以描述性分析說明這兩個族群的政治知識及其人口特徵；其次，透過 t 檢定檢證這兩個族群在政治知識及媒介使用行為上是否存在差異；最後，以多元迴歸分析比較分析這兩個族群之媒介使用行為變項對於其政治知識的解釋力。

⁴ 值得說明的是，由於「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四次：大眾傳播組(問卷一)」的問卷內容，並沒有測量傳統媒介（電視與報紙）的參與題項，故無法比較傳統與新興政治媒介參與的效果，為本研究的限制之一。

一、政治知識的測量結果與媒介使用情形

(一) 政治知識的回答情形

在政治知識的測量題目上，分為對政治人物的認知、制度與過程的瞭解以及國際相關事務的認知三個構面，民眾的政治知識分布情形如表 4-1 所示。在三個面向當中，以政治制度與過程的瞭解答對率最高，有 94.6% 的民眾能夠正確回答出我國憲法規定的總統任期，顯示民眾對於國家元首產生制度的熟悉度，此或許是我國總統選舉是由民眾直選所致。其次，對政治人物的認知方面，以中國大陸目前領導人的正確回答率較高（67.2%）；香港現任行政首長的正確回答率僅有不足兩成（18.5%），顯然民眾在此一方面的政治知識是較為缺乏，尤其是對香港的政治事務甚為陌生。最後，關於國際事務的問題上，針對臺灣的邦交情況，列舉三個不同的國家讓民眾選擇，只有 25.5% 的民眾正確回答，推測其原因可能是：臺灣的邦交國家大都為國際上較不活躍或是較為貧窮的小國家為主，民眾對於這些國家比較陌生；由於臺灣的外交情勢不穩定，常受到兩岸關係的影響，以致於建交、斷交的事件較常發生，民眾不易正確得知有邦交的國家。

整體而言，民眾的政治知識分布狀況以政治制度與過程的認識最高，其次為政治人物的相關認知，國際事務的理解則較低，此與林瓊珠（2005）的研究民眾政治知識長期變動的結果並不一致；另外，黃秀端（1996）亦指出從社會化理論的觀點，民眾的政治知識高低，始於政治人物的認知，其次為職務，最後才是制度的瞭解，本研究結果顯然亦不符合社會化理論的論點。此是否代表民眾的政治知識已經產生結構性的改變呢？就此而論，本研究所獲得的證據尚不足以支持此一推論，不過，本研究推測與過去研究不一致的原因，可能與政治人物認知的題目內容有關，從民眾對於事務的嫻熟程度而論，相較於本國的政治事務，民眾對於非本國的事物自然較為陌生，在政治人物的認知上亦同，本次調查在政治人物的測量題目均以國外的政治人物為詢問標的前提之下，民眾的正確回答率自然偏低，故在與歷年調查結果的比較與解讀上，或許應該更為謹慎。

表 4-1 2008 年民眾的政治知識回答正確率

對象	構面	題目	正確回答率
整體	政治人物	您知不知道香港現任的行政首長是誰？	18.5%
		您知不知道現在的中國大陸領導人是誰？	67.2%
	制度過程	您知不知道目前我國憲法規定的總統任期是幾年？	94.6%
		國際事務	您知不知道下列三個國家中，哪一個國家和臺灣有正式邦交？

資料來源：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四次：大眾傳播組(問卷一)

(二) 民眾的政治知識分數

若暫不考慮測量題項的難易度，將上述測量政治知識之各題項加總之後，可以獲得有關民眾政治知識的量表分數，代表其對於政治事務的瞭解程度，如表 4-2 所示。其中，答對 2 題的民眾比例最高（39.2%），依序為答對 3 題（25.9%）、答對 1 題（24.2%），答對 4 題（6.3%）與全部答錯（4.3%）比例最少。由此可知，大約七成一（71.4%）的民眾能夠答對一半以上的題目，但仍有 4.3% 的民眾沒有答對半題，顯示這些民眾對政治事務很可能是一無所知或不感興趣。接著，比較網路使用族群與非網路使用族群在政治知識分數上的表現可以得知，非網路使用族群全部答錯的比例近一成（8.7%），僅有五成七（57.0%）的比例能夠答對一半以上的題目；網路使用族群只有 1% 的比例是全部答錯，有八成二（82.4%）的比例能夠答對一半以上的題目，顯示網路使用族群的政治知識高於非網路使用族群，而究竟造成如此顯著差異的原因為何，則待後續分析逐步釐清。

表 4-2 2008 年民眾的政治知識分數分布情形

答對題數	整體		非網路使用族群		網路使用族群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0	85	4.3	74	8.7	11	1.0
1	480	24.2	293	34.3	187	16.6
2	777	39.2	318	37.3	459	40.7
3	513	25.9	139	16.3	374	33.2
4	125	6.3	29	3.4	96	8.5
總和	1980	100.0	853	100.0	1127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網路使用族群與非網路使用族群的人口結構分析

由前文的初步分析可知，網路使用族群的政治知識分布有異於非網路使用族群，本研究進一步檢視這兩個族群的人口結構，如表 4-3 所示。在性別方面，非網路使用族群的女性（52.6%）略高於男性（47.4%）；網路使用族群的性別比例剛好相反，男性（53.2%）略高於女性（46.8%）。在年齡方面，非網路使用族群主要是 40 歲以上，其中以 60 歲以上的比例最多（47.8%）；網路使用族群以 39 歲以下居多。在教育程度方面，非網路使用族群最高學歷主要以國中以下最多（74.7%），依序為高中（20.6%）、專科（3.4%）；網路使用族群則以大學以上最多（42.6%），依序為高中（30.3%）、專科（20.3%）。此外，經由卡方檢定的結果，亦證實網路使用族群與非網路使用族群在性別（ $\chi^2=6.708$, $p=0.010$ ）、年齡（ $\chi^2=902.913$, $p=0.000$ ）、與教育程度（ $\chi^2=1077.619$, $p=0.000$ ）等變項均達顯著水準，顯示兩者的人口結構存在明顯差異。

由此可知，網路使用族群與非網路使用族群在人口結構上呈現若干差異，特別

是在年齡與教育程度上的不同，非網路使用族群的人口特性主要為年齡較長（50歲以上）、教育程度較低（國中以下）；而網路使用族群則是年齡較輕（39歲以下）、教育程度較高（高中以上），這些結果與過去的相關研究結論相似。據此，本研究認為網路使用族群與非網路使用族群在人口結構上的差異，可能會反應在媒介使用行為上，進而影響媒介使用行為對政治知識的解釋能力，故本研究在下節內容進一步透過平均數差異分析（t 檢定），檢證這兩個族群在政治知識分數和媒介使用行為上是否有所不同。

表 4-3 網路使用族群與非網路使用族群的人口結構分析

變項名稱	類別	非網路使用族群		網路使用族群		卡方檢定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404	47.4	600	53.2	$\chi^2=6.708$ $p=0.010$
	女	449	52.6	527	46.8	
	總和	853	100.0	1127	100.0	
年齡	29歲以下	7	0.8	428	38.0	$\chi^2=902.913$ $p=0.000$
	30-39歲	40	4.7	283	25.1	
	40-49歲	167	19.6	230	20.4	
	50-59歲	231	27.1	147	13.0	
	60歲以上	408	47.8	39	3.5	
	總和	853	100.0	1127	100.0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637	74.7	77	6.8	$\chi^2=1077.619$ $p=0.000$
	高中	176	20.6	341	30.3	
	專科	29	3.4	229	20.3	
	大學以上	11	1.3	480	42.6	
	總和	853	100.0	1127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網路與非網路使用族群的政治知識差異

在瞭解網路使用族群與非網路使用族群的人口結構差異後，本研究進一步透過 t 檢定分析來檢證這兩個族群在政治知識與媒介使用行為的差異，相關分析如表 4-4 所示。首先，在政治知識分數部分，非網路使用族群的平均數為 1.71、標準差為 0.95，網路使用族群的平均數為 2.32、標準差為 0.88，經由 t 檢定發現兩者達顯著水準（ $t=-14.387$, $p<0.001$ ），再次顯示這兩個族群的政治知識有顯著差異，後者的政治知識分數明顯高於前者。其次，在傳統媒介暴露程度部分，非網路使用族群的平均數為 1.14、標準差為 0.96，網路使用族群的平均數為 1.59、標準差為 0.84，經由 t 檢定發現兩者達顯著水準（ $t=-10.912$, $p<0.001$ ），顯示這兩個族群在傳統媒介暴露程度亦有顯著差異，後者的暴露程度明顯高於前者。最後，在傳統媒介注意程度部分，非網路使用族群的平均數為 1.52、標準差為 1.81，網路使用族群的平均數為

2.67、標準差為 1.52，經由 t 檢定發現兩者達顯著水準 ($t=-14.968, p<0.001$)，顯示這兩個族群在傳統媒介注意程度同樣有顯著差異，後者的注意程度明顯高於前者。

綜上所述，吾人可以發現，網路使用族群無論是政治知識分數或媒介使用程度均高於非網路使用族群，造成此一差異的原因或許可以從幾個面向作一討論：第一，網路使用族群多了一個透過網際網路取得政治知識的管道，致使其政治知識高於非網路使用族群；第二，網路使用族群在傳統媒介的暴露程度高於非網路使用族群，顯示網路使用族群並未排斥接觸傳統的媒介管道，或是以新興媒介而代之，甚至可以說網路使用族群是處於「雙重暴露」之中；第三，網路使用族群對傳統媒介的注意程度高於非網路使用族群，顯見前者可能較後者更投入於政治知識的汲取上，這應是其政治知識分數亦較高的原因。這些可能原因是否成立，除了本研究利用多元迴歸分析進行檢證外，亦有待其他研究透過量化或質化方法予以補強。

表 4-4 網路使用族群與非網路使用族群之 t 檢定

變項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value
政治知識分數	無上網經驗	853	1.71	0.95	-14.387***
	有上網經驗	1127	2.32	0.88	
傳統媒介暴露	無上網經驗	853	1.14	0.96	-10.912***
	有上網經驗	1127	1.59	0.84	
傳統媒介注意	無上網經驗	853	1.52	1.81	-14.968***
	有上網經驗	1127	2.67	1.52	

*** : $P < .001$, ** : $P < .01$, * :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網路與非網路使用族群之政治知識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利用多元迴歸分析技術中的階層迴歸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比較非網路使用族群與網路使用族群兩個不同的模型，藉以回答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問題，同時，驗證各項研究假設成立與否。在進行分析之前，由於受限於資料的特性，有兩點必須特別提出說明。其一，因 2008 年的調查題目並沒有涵蓋傳統媒介的政治參與程度，以致於無法檢證傳統媒介參與程度對政治知識的影響；其二，因為非網路使用族群無使用網路的相關經驗，故在模型一沒有納入新興政治媒介暴露、新興政治媒介注意及新興政治媒介參與等變項。不過，這兩項限制並不影響分析結果對研究問題的回答，反而可以藉由控制新興政治媒介來分析影響網路使用族群之政治知識的因素，迴歸分析結果如下所述。

在非網路使用族群的階層迴歸部分，首先，檢視人口結構變項對政治知識的解釋力，從表 4-5 中得知，在模型一當中，調整後 R^2 為 23.0%，F 檢定達顯著水準 ($p<0.05$)，且各個自變項之間的共線性問題並不嚴重，顯示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變項可以解釋非網路使用族群 23.0%的政治知識變異量。在個別迴歸係數的部

分，所有變項均達顯著水準，顯示人口結構變項有助於解釋解釋非網路使用族群政治知識的變異；接著，本研究將傳統媒介使用行為納入，從表 4-5 的模型二可以得知，調整後 R^2 為 34.8%，F 檢定達顯著水準 ($p < 0.05$)，且各個自變項之間的共線性問題並不嚴重，顯示在人口結構變項之外，再加入傳統媒介使用行為變項後，對非網路使用族群的政治知識變異量增加了 11.8% 的解釋力，代表媒介使用行為有助於提升對政治知識的解釋能力。在個別迴歸係數的部分，除高中教育程度與傳統媒介注意程度未達顯著水準，其餘變項均達顯著水準：在性別方面，男性的政治知識比女性高；在教育程度方面，專科、大學以上者的政治知識比國中以下者高；在傳統媒介暴露方面，非網路使用族群的暴露程度愈高，其政治知識也愈高，且在所有變項之中，此一變項的解釋力最高 ($Beta = 0.345$)。值得注意的是，年齡雖然達顯著水準，但年齡與政治知識兩者的關係為負向關係，此一結果顯示，年齡愈大的非網路使用族群，其政治知識愈貧乏。

表 4-5 非網路使用族群階層迴歸分析模型

變項名稱	模型一				模型二			
	B 值	標準誤	Beta	VIF	B 值	標準誤	Beta	VIF
(常數)	2.210	.201			1.830	.208		
男性【參照：女性】	.471	.087	.247***	1.035	.318	.082	.167***	1.092
年齡	-.154	.033	-.219***	1.133	-.154	.031	-.218***	1.167
高中【參照：國中以下】	.399	.113	.170***	1.163	.163	.110	.069	1.277
專科【參照：國中以下】	1.005	.239	.191***	1.033	.700	.224	.133**	1.065
大學以上【參照：國中以下】	.996	.378	.118**	1.007	.750	.351	.089*	1.017
傳統媒介暴露	/	/	/	/	.342	.059	.345***	2.100
傳統媒介注意	/	/	/	/	.037	.047	.044	1.816
	樣本數 = 853 R=47.9%, Adj R ² = 23.0% F=23.012, p<0.000				樣本數 = 853 R=59.0%, Adj R ² = 34.8% F=29.269, p<0.000			

*** : $P < .001$, ** : $P < .01$, * :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在網路使用族群的階層迴歸部分，首先，檢視人口結構變項對政治知識的解釋力，從表 4-6 的模型三可以得知，調整後 R^2 為 14.4%，F 檢定達顯著水準 ($p < 0.05$)，教育程度變項與其他變項存在較高的共線性問題，顯示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可以解釋網路使用族群 14.4% 的政治知識變異量，不過，若與模型一相比較，其解釋力少了近 10%，亦即這些變項對網路使用族群之政治知識變異量的解釋力不如非網路使用族群。在個別迴歸係數的部分，僅高中教育程度未達顯著水準，顯示人口結構變項有助於解釋解釋網路使用族群政治知識的變異。接著，將傳統媒介使用行為納入分析，從模型四可以得知，調整後 R^2 為 17.0%，F 檢定達顯著水準 ($p < 0.05$)，

教育程度變項仍與其他變項存在較明顯的共線性問題，顯示在人口結構變項之外再加入傳統媒介使用行為變項，對政治知識變異量的解釋力提高有限（增加 2.6%）。在個別迴歸係數的部分，除高中教育程度與傳統媒介注意程度未達顯著水準，其餘變項均達顯著水準：在性別方面，男性的政治知識比女性高；在年齡方面，年齡愈高其政治知識愈高；在教育程度方面，專科、大學以上者的政治知識比國中以下者高；在傳統媒介暴露方面，網路使用族群的暴露程度愈高，其政治知識也愈高。最後，將新興媒介使用行為納入分析，從模型五可以得知，調整後 R^2 為 16.9%，F 檢定達顯著水準（ $p < 0.05$ ），顯示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傳統媒介使用行為共可以解釋網路使用族群 16.9% 的政治知識變異量，但教育程度變項與其他變項存在較明顯的共線性問題，代表網路使用族群的新興媒介使用行為並無助於解釋政治知識的變異。在個別迴歸係數的部分，高中教育程度、傳統媒介注意程度以及新興媒介使用行為均未達顯著水準；在性別方面，男性的政治知識比女性高；在年齡方面，年齡愈高其政治知識愈高；在教育程度方面，專科、大學以上者的政治知識比國中以下者高，且在所有變項之中，以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解釋力最高（ $Beta = 0.322$ ）；在傳統媒介暴露方面，網路使用族群的暴露程度愈高，其政治知識也愈高。

表 4-6 網路使用族群階層迴歸分析模型

變項名稱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B 值	標準誤	Beta	VIF	B 值	標準誤	Beta	VIF	B 值	標準誤	Beta	VIF
(常數)	1.004	.166			1.019	.182			.953	.201		
男性【參照：女性】	.264	.064	.149***	1.004	.245	.064	.139***	1.016	.238	.064	.134***	1.033
年齡	.219	.027	.310***	1.072	.180	.028	.256***	1.202	.187	.028	.266***	1.258
高中【參照：國中以下】	.241	.137	.125	3.852	.172	.136	.089	3.897	.177	.137	.092	3.994
專科【參照：國中以下】	.520	.143	.237***	3.226	.443	.142	.202**	3.269	.430	.145	.196**	3.413
大學以上【參照：國中以下】	.710	.136	.398***	4.384	.596	.136	.334***	4.528	.574	.142	.322***	4.930
傳統媒介暴露	/	/	/	/	.210	.046	.201***	1.537	.191	.050	.182***	1.808
傳統媒介注意	/	/	/	/	-.042	.038	-.047	1.457	-.057	.044	-.064	1.913
網路媒介暴露	/	/	/	/	/	/	/	/	.023	.046	.025	2.134
網路媒介注意	/	/	/	/	/	/	/	/	.032	.047	.035	2.009
網路媒介參與	/	/	/	/	/	/	/	/	.045	.080	.023	1.331
	樣本數 = 1127 R = 38.8%, Adj R ² = 14.4% F = 22.749, p < 0.000				樣本數 = 1127 R = 42.3%, Adj R ² = 17.0% F = 19.992, p < 0.000				樣本數 = 1127 R = 42.7%, Adj R ² = 16.9% F = 140214, p < 0.000			

*** : $P < .001$, ** : $P < .01$, * :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

比較表 4-5 與表 4-6 的階層迴歸模型即可以發現，即便是相同的變項，對於網路使用族群與非網路使用族群的解釋效果明顯不同，本文針對箇中的若干差異提出造成該現象的可能解釋。首先，在階層迴歸分析整體模型解釋力部分，非網路使用族群的人口結構對其政治知識的解釋力較高（模型一），而網路使用族群的人口結

構對其政治知識的解釋力較低（模型三）；非網路使用族群的模型加入傳統媒介使用行為後，對其政治知識的解釋力提升較多（模型二），而網路使用族群的模型加入傳統媒介使用行為後，對其政治知識的解釋力增加十分有限（模型四）。由此可知，無論人口結構或傳統媒介使用行為對非網路使用族群之政治知識的解釋力，遠遠高於對網路使用族群之政治知識的解釋力，本文認為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由表 4-2 與表 4-4 可知，相較於非網路使用族群的政治知識，網路使用族群的政治知識分數較高且集中；另外，由表 4-3 可知，相較於非網路使用族群的人口結構，網路使用族群的年齡集中於 39 歲以下、教育程度則集中於專科以上，在自變項與依變項雙重集中的情況之下，變項之間的變異量驟減，整體模型的解釋力自然下降。其二，由表 4-6 得知，無論是人口結構或媒介使用行為變項，對網路使用族群之政治知識的解釋力明顯低於非網路使用族群，表示應該還有其他重要變項可以用來解釋網路使用族群的政治知識變異，且這些變項與媒介的使用行為無關，可能是與政治接觸或政治興趣等變項有關，也是值得後續研究再加以討論的方向。

其次，在階層迴歸分析迴歸係數部分，由表 4-5 得知，當傳統媒介使用行為加入模型之後，非網路使用族群的迴歸係數發生明顯的變化，由原先人口結構變項中的男性解釋能力最高（Beta=0.247，模型一），改變為傳統媒介暴露解釋能力最高（Beta=0.345，模型二）；而由表 4-6 得知，當傳統媒介使用行為加入模型之後，網路使用族群的迴歸係數雖然發生改變，卻不影響人口結構變項對政治知識的解釋力，仍然以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解釋能力最高（Beta=0.398，模型三；Beta=0.334，模型四），其次為年齡（Beta=0.310，模型三；Beta=0.256，模型四），顯示傳統媒介使用行為對網路使用族群之政治知識的解釋力偏低。有趣的是，如果對照表 4-4 的結果，會發現網路使用族群使用傳統媒介的程度其實是高過於非網路使用族群。綜言之，在分析媒介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兩者的關聯上，本研究發現網路使用族群具備「高度媒介使用，低度模型解釋」的特質，此或許是傳統媒介的使用行為對政治知識的解釋力已被其他變項所稀釋，且由模型五可知，這些其他變項並非是新興媒介的使用行為。

最後，新興媒介的使用行為均未達顯著水準（模型五），顯示新興媒介的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取得的關聯性並不高，即假設 H1b、H2b 和 H3 不成立，此或許與網路使用的特質密切相關，如 Tewksbury（2003）便指出，網際網路相較於傳統新聞傳播媒介，提供使用者更自由的新聞選擇性，不必受限於印刷編輯的排版框架，使用者可以選擇自己喜愛的新聞內容來閱讀，同時，網際網路也是有力的搜尋工具，可以讓增加新聞閱讀的深度與廣度。不過，學者也提出警告，因為網際網路世界中的相關報導，部分可能來自於非專業的新聞人員所撰寫，因此，在內容的成熟度、嚴謹度、可信度與廣度都值得考量（Kaufhold, Valenzuela & Zúñiga, 2010）。由此可知，在評估新興媒介的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之間的關係就更顯複雜，在網際網路政治新聞沒有任何框架與規範的限制之下，可能會因為使用者只關注某些特定的議題（Tewksbury, 2003），或受到不正確的資訊影響（Kaufhold, Valenzuela & Zúñiga, 2010），而干擾媒介的暴露、注意或參與等使用行為變項對政治知識變異的解釋力。

伍、結 論

公民的政治參與為民主政治的體現之一，而政治參與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應該具備政治的相關知識以及瞭解政治體系的運作，此一政治知識即是攸關民眾對於政治相關事務的認知、理解與評價。爰此，透過測量民眾政治知識的高低，或許可以作為決定政治參與程度的衡量標準之一，因為只有當民眾瞭解政治體系的運作之後，才有可能參與政治，如果對基本的政治運作過程一無所知，民眾根本無法參與政治（黃秀端，1996；林瓊珠，2005），更遑論有意義的參與。雖然就相關研究成果而言，現實情況並不如古典民主理論所描述的烏托邦社會一樣地完美，人人都具備充足的政治知識，且熟知政治運作的過程，但是，至少值得慶幸的是，民眾的政治知識有逐漸朝向增加的趨勢（林瓊珠，2005）。在此一基礎上，本研究進一步揭開在大眾傳播媒體多元化的社會中，比較分析網路使用族群與非網路使用族群的媒介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之間的關聯性，以釐清不同媒介的使用行為對政治知識取得的影響程度。

本研究的分析結果發現，網路使用族群的政治知識明顯高於非網路使用族群，而且前者在傳統媒介的暴露與注意程度亦均高於後者，顯示網路使用族群較具備政治參與的條件，對於民主治理的實踐提供了較為有利的契機。不過，就媒介使用行為變項而言，無論是網路使用族群或非網路使用族群，其政治知識的高低均與傳統媒介的暴露程度有關，但與其他變項的關聯性並不明顯。雖然本研究的結果顯示似乎僅有傳統媒介的暴露程度能夠影響政治知識，但是參照過去的相關研究，傳統媒介的注意程度對於政治知識其實也會產生影響，本研究推論可能的原因在於政治知識題組的測量的內容不同，或者是媒介使用行為測量題組不同，才會導致與過去研究不同的結論。因此，或許後續的研究可以藉由比較跨年度的調查資料以檢證此部分的問題。

最後，另一個值得後續研究加以深入分析的發現是，即便網路使用族群的政治知識相對較高，但以網際網路為基礎之新興媒介的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之間並無顯著的關聯性，這個結果可能與倡議電子化民主之樂觀論者的期待相左，因民眾對網路媒介的使用並非是為了擷取更豐富的政治知識或者參與政治事務。然而，此份研究資料調查時間為 2008 年蒐集完成，在目前資訊科技一日千里的情況之下，經過這幾年來的顯著發展（包括智慧手機、無線寬頻、雲端運算等技術的出現），新興媒介使用行為與政治知識兩者的關係是否有所改變？以及如何改變？此一議題仍值得後續研究者加以關注與析探。

參考文獻

- 王嵩音，2006，〈網路使用與選舉參與之研究—以 2004 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臺灣民主季刊》，3(4)，頁 71-102。
- 行政院研考會，2011，**100 年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報告**。資料來源：<http://www.rdec.gov.tw/public/Attachment/21301483471.pdf>。瀏覽日期：2012/02/01。
- 林瓊珠，2005，〈臺灣民眾的政治知識：1992-2000 年的變動〉，《選舉研究》，12(1)，頁 147-171。
- 林震岩，2007，《多變量分析：SPSS 的操作與應用》，台北：智勝文化。
- 林聰吉、王淑華，2007，〈臺灣民眾政治知識的變遷與來源〉，《東吳政治學報》，25(3)，頁 93-129。
- 林東清，2008，《資訊管理：e 化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台北：智勝。
- 邱浩政，2005，《量化研究法（二）統計原理與分析技術：SPSS 中文視窗版操作實務詳析》，台北：雙葉書廊。
- 翁秀琪、孫秀慧，1994，〈選民的媒介使用行為及其政治知識、政黨偏好與投票行為之間的關聯—兼論臺灣媒體壟斷對政治認知與行為之影響〉，《選舉研究》，2，頁 1-25。
- 莊文忠譯，Robert L. Miller 等人著，(2006)，《SPSS 在社會科學的應用》，台北：五南書局。
- 張卿卿，2002，〈大學生的政治媒介認知、政治媒介行為與其政治效能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選舉研究》，9(2)，頁 37-63。
- 陳敦源，2009，《民主治理：公共行政與民主政治的制度性調和》。台北五南。
- 陳敦源，2010，〈民主治理與電子化參與〉，《T&D 飛訊》，83，頁 1-18。
- 黃秀端，1996，〈政治知識之認知與性別差異〉，《東吳政治學報》，5，頁 27-50。
- 黃東益，2003，《民主商議與政策參與：審慎思辨民調的初探》。台北韋伯。
- 彭芸，2007，〈我國民眾媒體內容偏好與其政治態度之關連性研究〉，《選舉研究》，14(1)，頁 85-117。
- 傅恆德，2001，〈政治知識與政治評價：第四屆立法委員〉，《東海社會科學學報》，21，頁 103-119。
- 傅恆德，2005，〈政治知識、政治評價與投票選擇：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研究〉，《選舉研究》，12(1)，頁 39-68。
- 劉嘉薇，2006，〈大眾傳播媒介與大學生政治信任感關聯性之研究〉，《東亞研究》，37(1)，頁 162-196。
- 羅文輝、鐘蔚文，1991，〈電視新聞對青少年政治知識的影響〉，《新聞學研究》，45，頁 81-99。
- 瀟湘文，1994，〈大學生媒體之使用與政治涉入程度之關聯性研究：以 1998 年底台北三合一選舉為例〉，《民意研究季刊》，208，頁 79-104。

- Best, Samuel J. & Brian S. Krueger (2005). Analyzing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Interne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27(2): 193-216.
- Bucy, P. E. & Kimberly S. Gregson (2001). Media Participation: A Legitimizing Mechanism of Mass Democracy. *New Media & Society*, 3(3): 357-380.
- Delli Carpini, X. M. & Scott Keeter. (1993). Measuring Political Knowledge: Putting First Things Firs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4): 1179-1206.
- Delli Carpini, X. M. & Scott Keeter. (1996).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Easton, David. (1953). *The Political System*. NYC, NY: Knopf.
- Galston, W. A. (2001). Political Knowledge,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Civic Educ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 217-234.
- Garson, G. D. (2006). *Publ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Government: Managing the Virtual State*, Jo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
- Hacker, Kenneth L. & van Dijk, J. (2000). *Digital Democracy: Issues of Theory & Practice*, Bererly Hills: Sage.
- Hair, J. F., W. C. Black, B. J. Babin, R. E. Anderson & R. L. Tatham. (2006).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6th,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earson Prentice Hall.
- Holmeas, J. W. (2004). Motivation, Internet Use,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Presented at the 2004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IL.
- Jennings, M. Kent (1996). Political Knowledge Over Time and Across Generation. *Political Opinion Quarterly*, 60(2):228-252.
- Jenssen, A. Todal. (2009). Does Public Broadcasting Make a Difference?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Electoral Campaigns on Television.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32(3):247-271.
- Kampen, J. & K. Snijkers. (2003). E-Democracy: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Ultimate E-Dream.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1(4):491-496.
- Kakabadse, A., N. K. Kakabadse & A. Kouzmin, (2003). Reinventing the Democratic Governance Project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Growing Agenda for Debat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3(1):44-60.
- Kaufhold, K., B. Valenzuela and Homero Gil de Zúñiga. (2010) Citizen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How User-Generated News Use Relates to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7: 515-529.
- Salazar, J. L., Piles, J. J., Ruíz J. and Moreno-Jiménez, J. M. (2008). E-cognocracy and its voting process. *Computer Standards & Interfaces*, 30: 124-131.
- Shaker, B. Lee .(2009). Citizen's Local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The Role of Media

- Acces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6: 809-826.
- Moy, P., McCluskey, M. R., McCoy, K. and Spratt, M. A. (2004). Political Correlates of Local News Media U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4: 532–546.
- Tewksbury, D. (2003). What Do Americans Really Want to Know? Tracking the Behavior of News readers on the Interne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3 , 694-710.
- Visser, P. S., Holbrook, A. & J. A. Krosnick. (2008).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The SAGE Handbook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edited by W. Donsbach and M. W. Traugott. London: SAGE Published Ltd.

附錄一 研究變項的測量與處理

變項名稱	測量數值與內容
一、控制變項	
性別	a1 性別 男性 (1)、女性 (2)。 以女性為對照組。
年齡	a2 請問您是哪一年出生的?民國__年 重新換算為受訪者的年齡
教育程度	a8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將原本的 22 個類別，依照常用的分類合併成 4 類 (國小以下個數不多)，劃分為國中以下 (1)、高中 (2)、專科 (3)、大學以上 (4)。以國中以下為對照組。
二、依變項	
政治知識	ela 您知不知道目前我國憲法規定的總統任期是幾年? elb 您知不知道現在的中國大陸領導人是誰? elc 您知不知道下列三個國家中,哪一個國家和台灣有正式邦交? eld 您知不知道香港現任的行政首長是誰? 每個問題均有三個選項，若受訪者回答正確就給予 1 分，回答錯誤或者沒有回答不予給分。將每題答案加總，分數愈高，代表政治知識愈高。

變項名稱	測量數值與內容
三、自變項	
<p>傳統 媒介暴露</p>	<p>d7a 您觀看電視上的政治新聞嗎? d8a 您閱讀報紙所報導的政治新聞嗎? 每個問題均為四等刻度的量表【從來不看(4)、很少看(3)、有時會看(2)、經常看(1)】。本研究將遺漏值以平均數進行插補，回答從來不看給予0分，很少看給予1分，有時會看給予2分，經常看給予3分，將兩題得分加總後再除以題數，分數愈高，代表傳統媒介暴露程度愈高。</p>
<p>新興 媒介暴露</p>	<p>d9a 您閱讀電子報、bbs 或網路上的政治新聞嗎? 問題為四等刻度的量表【從來不看(4)、很少看(3)、有時會看(2)、經常看(1)】。本研究將遺漏值以平均數進行插補，回答從來不看給予0分，很少看給予1分，有時會看給予2分，經常看給予3分，分數愈高，代表新興媒介暴露程度愈高。</p>
<p>傳統 媒介注意</p>	<p>d7b 當您觀看電視上的政治新聞報導時，您的注意程度為何? d8b 當您閱讀報紙所報導的政治新聞時，您的注意程度為何? 每個問題均為五等刻度的量表【非常不注意(5)、有些不注意(4)、普通(3)、有些注意(2)、非常注意(1)】。本研究將遺漏值以平均數進行插補，其餘選項則以反向加總後除以題數，分數愈高，代表傳統媒介注意程度愈高。</p>
<p>新興 媒介注意</p>	<p>d9b 當您閱讀電子報、bbs 或網路上的政治新聞時，您的注意程度為何? 問題為五等刻度的量表【非常不注意(5)、有些不注意(4)、普通(3)、有些注意(2)、非常注意(1)】。本研究將遺漏值以平均數進行插補，其餘選項則以反向加總，分數愈高，代表新興媒介注意程度愈高。 c15b 請問您透過網路和朋友討論政治話題的情形如何? c15c 請問您透過網路向媒體表達我對政治議題的看法的情形如何? c15d 請問您透過網路向民意代表或政治人物反映對政治議題的意見的情形如何?</p>
<p>新興 媒介參與</p>	<p>c15e 請問您在網路上表達我對政治議題的看法的情形如何? c15f 請問您在網路上參與與政治相關議題進行投票的情形如何? 問題均為四等刻度的量表【從來沒有(4)、很少(3)、有時(2)、經常(1)】。本研究將遺漏值以平均數進行插補，回答從來不看給予0分，很少給予1分，有時給予2分，經常給予3分，將五題得分加總後再除以題數，分數愈高，代表新興媒介參與程度愈高。</p>